

結社的藝術

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

主編——張藝曠

結社的藝術：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

2020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6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主編	張王何許	藝昌淑齊淑佩佳	曠偉宜雄芬伶德
叢書主編	沙陳沈		
校對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1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6925588 轉5310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副總編輯 陳塗
總編輯 陳芝
總經理 陳國
社長 羅國
發行人 林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5656-9 (平裝)
聯網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結社的藝術：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張藝曠主編。

王昌偉、何淑宜、許齊雄編。初版。新北市。聯經。2020年12月。

576面。14.8×21公分

ISBN 978-957-08-5656-9 (平裝)

1.文化史 2.文學 3.社團 4.亞洲

730.3

1090186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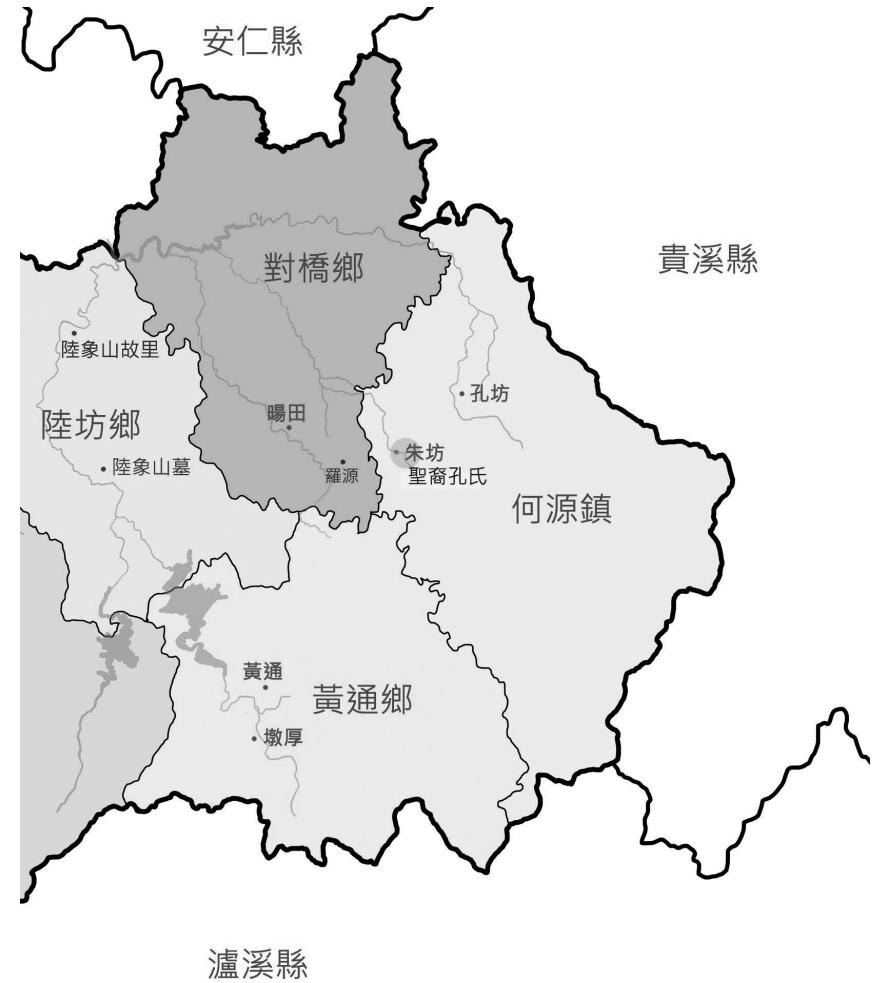
明及清初地方小讀書人的 社集活動

以江西金溪為例*

張藝曠 —

臺灣臺中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明清思想史、地方史與家族史。代表作：《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2006）、〈明中晚期古本《大學》與《傳習錄》的流傳及影響〉（2006）、《孤寂的山城：悠悠百年金瓜石》（2007）、〈飛昇出世的期待：明中晚期士人與龍沙讖〉（2012）、〈明代陽明畫像的流傳及其作用——兼及清代的發展〉（2016）等。

* 有關同時期江西全境的社集發展及思想文化風潮的變動，請參見張藝曠，〈明中晚期江西詩、文社集活動的發展與動向〉，《新史學》31卷2期（台北，2020），頁65-115。



金溪縣圖
本圖是根據2011年4月江西省第三測繪院編製，江西省測繪局與金溪縣國土資源局監製的《金溪縣地圖》，在其基礎上重新繪製而成。繪製者為湯燕茹學妹。

一、前言

江西依其文化發展程度，至少可分作南昌、吉安與撫州三大區域，而明中期有文學復古運動與心學運動，明末有制藝風潮，三地皆在這幾股風潮中。明中期的南昌以余曰德（1514-1583）、朱多煃（1534-1593）兩位復古派健將為中心舉行詩文社集，吉安則是陽明心學的重鎮，以鄒守益（1491-1562）父子孫三代主持講學最為著名。撫州地區，廣義來看可包括撫州府與建昌府，¹心學方面有金溪吳悌（1502-1568）、新城鄧元錫（1529-1593），而聲光最盛，影響也最大的則推羅汝芳（1515-1588），文學方面有臨川湯顯祖（1550-1616）與金溪謝廷諒（1551-？）兄弟，但不屬於復古派陣營。

南昌作為省會，向來較易得到研究者的關注，而近一二十年來亦有人討論吉安的陽明心學，唯獨迄今對撫州地區的了解仍少。羅汝芳、湯顯祖這些大名字大人物，固然得到許多人的注意，相關論文亦多如牛毛，但多把焦點放在個人學術思想或文學成就，而較少從地方史或地域研究的角度出發。

思想文化史若從地方史或地域研究出發，便不能只注意大名字大人物，也必須關照地方上沒有偌大聲名的小讀書人。過去思想文化史較多利用知名士人的文集、筆記、書信等文獻資料，藉此梳理出以這些士人為中心形成的群體或文化圈，然後配合地方志，便有可能粗略的勾勒出這個群體或文化圈的範圍及作為。但我們也不免進一步注意到，在這類群體或文化圈中，還有許多二流的、在地的小讀書人，他們雖有著作，但幾乎皆已不存，

而這類小讀書人往往在當地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常是一些社集的主要成員。

這也表示我們必須擴大史料的範圍，而族譜應是可用的史料之一。對社會史、經濟史的研究者而言，族譜已算是很常用的史料，而且有許多人對族譜記述內容作深入的解析。²但在思想文化史，以及對地方小讀書人及其社集活動的研究上，則仍較少用這類資料。族譜有許多對個人交游及其生平作為的敘述，這類敘述常有對個人的溢美或攀援附會之詞，但所敘述的言行事為則不見得是憑空捏造的。例如某本族譜談及某個社集，稱此社集聚集許多人，我們自然不會聽信此片面之詞，但若是不同家族的族譜都共同指向這個社集活動時，則應可確認這個社集在當時是有影響力的。

今日臨川的城市化頗高，蒐尋族譜的困難度高，事倍功半，而難以成功，這正是為何將眼光轉向金溪的原因。金溪的文教成就亦高，宋代陸九淵（1139-1192）、明初狀元吳伯宗（1334-1384），以及明中期的大儒吳悌皆出自此地，而且金溪另以出版著稱，躋灣鎮在清代是全國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另一方面，金溪的城市化不高，許多村落仍然保存過去的面貌，根據金溪方志辦的調查，當地族譜古譜仍存的，至少有600多部，通過田野的蒐集，極有可能藉由這些族譜重新復活當地小讀書人的交游與社集活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臨川、金溪兩縣士人的關係十分密切，當地向來有「臨川才子金溪書」之謠。過去我們熟悉的是湯顯祖、江右四大家這些大名字大人物，或從錢謙益（1582-1664）

¹ 如今日中國大陸的行政劃分，便將明代的兩府都劃入撫州地區。

² 如科大衛，《明清社會和禮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的《列朝詩集小傳》而知謝廷諒兄弟與湯顯祖爭勝，³但除此以外，對臨川與金溪在思想文化上的關係所知有限。一旦進入個別地域層次，定睛在這些小名字小人物，反而很意外發現兩地之間竟然有著緊密的聯繫與社集活動，而且我們甚至可以推測，這是以臨、金兩縣為中心的社集活動。儘管從金溪一縣切入，但卻可看到整個撫州地區。

二、學術系譜的建構與自立

金溪的學術文化傳統，較近的有宋代的陸九淵學術，但在地流傳不久，入明以後已完全不見其學術流傳的記載。不過，金溪跟理學的關係仍然是較為親近的，只是明代金溪沒有知名理學家，所以往往受到外來學術的影響。明初首先有吳與弼（1391-1469）學術的進入。吳與弼是崇仁縣人，只在金溪的鄰縣，舉林車氏家族便受其學術的影響。這個家族有族人習於吳與弼門下，以及吳與弼親蒞車氏家族所在地講學，直到明中期家族史的敘述中，都不斷回顧這段往事。

車寶與車福二兄弟是這個家族的中心人物。車寶的長子車恂，以及車福的長子車貞，二人分別在正統七年（1442）與景泰四年（1453）的兩次饑荒中輸米二千石助賑，先被旌表為義民，後被賜冠帶。⁴從輸米力賑事，可知這個家族，尤其是車寶的這個房支是比較殷實而有貲財的房支，但其文化水平則僅一般。即使

³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丁集中，〈帥思南機〉小傳，頁565-566。

⁴ 《舉林車氏十脩族譜》（金溪縣灣鎮黃坊車家車澤民家藏，民國二十四年版本），〈四六公房世系〉，3號。

有意學習者如車寶，他從五河教諭李子亮游，得朱熹（1130-1200）的《性理吟》⁵作為家學傳習，但《性理吟》畢竟只是一本啟蒙讀物，顯示車寶對理學的了解很有限。

景泰四年（1453）是關鍵的轉折點。這是車恂與車貞第二次賑濟而得到朝廷表彰，當年，吳與弼過訪其族，而過訪的原因則與其賑濟尚義的行為有關，⁶所以吳與弼為車福之子車紹祖的讀書處題「尚義堂」三字，⁷以標榜該族（尤其是該房支）的義行。

世系	第八世	第九世	第十世	第十一世
人名	車習義	車寶	車恂 車貞（輸穀賑濟）	
		車福	車紹祖（吳與弼為題尚義堂）	車泰來

從吳與弼過訪其族以後，該族有所轉變。在此之前，車氏族人所從學的對象是地方士紳（如何自學〔1397-1452〕），此後則

⁵ 東景南主張《性理吟》是後人偽作，見東景南，《朱熹佚文輯考》（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687-702。另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記，正德年間譚寶煥作《性理吟》，以《四書》及性理中字句為題，前列朱子之說，而以一詩括其意。見《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第29冊，別集類存目3，卷176，頁1579。

⁶ 關於明初義行與理學的關係，請見向靜，〈感仁興義、樹立風聲：明代正統年間義民形象的塑造〉，《北大史學》19（北京，2014），頁96-116。

⁷ 《舉林車氏十脩族譜》，〈四六公房世系〉，7號。車紹祖是該族中文化素養較高的，所以他早年便即跟隨地方士紳何自學學習。何自學是宣德丁未（1427）進士，在金溪當地頗知名，在當地的許多族譜中都有他所作序。儘管車紹祖不是賑濟者，但推測該房支僅車紹祖有書齋，所以便讓吳與弼在其書齋題字。

是習於吳與弼門下。⁸天順二年（1458），吳與弼又受邀來到車氏家族，且在尚義堂中講學，⁹該族族譜載：

昔賢吳康齋先生，與生徒會社於茲，族中先型，多出其門。¹⁰

族人以車泰來、車弼宗、車亨三人最著名。¹¹據車氏族譜，車亨¹²、車弼宗¹³與車泰來三人是族兄弟，其中車泰來的聲名最著，他從吳與弼游，學得其傳。吳與弼在崇仁縣的傳人是胡九韶，¹⁴在金溪的傳人則是車泰來。車泰來曾奉師命赴京上表謝恩。從其譜中所記載，徐瓊（1505-？）、丘濬（1421-1495）、楊守陳（1425-1489），皆有詩文相贈，顯示車泰來已非金溪當地的士人，而且得到更大的聲名。他歸鄉後，另構舉林書屋講學。

儘管如此，吳與弼對金溪所帶來的影響其實有限，所以直到明中期心學流行以前，地方上接觸理學並傳習其學的，便僅見舉林車氏一族而已。明初金溪士人多習於當地士紳或博學之士的門

⁸ 轉向吳與弼學習一事，也可能是何自學所建議，因為何自學正是向朝廷推薦吳與弼的官員之一。見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800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道光六年刊本影印），卷11，〈宦業〉，頁7-8。

⁹ 《舉林車氏十脩族譜》，〈四六公房世系〉，3號。

¹⁰ 車尚殷，〈舉林記〉，《舉林車氏十脩族譜》，70號。

¹¹ 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0，〈儒林〉，頁13。

¹² 《舉林車氏十脩族譜》，〈四六公房世系〉，60號。

¹³ 同上注，23號。

¹⁴ 許應鑑修，謝煌纂，《(光緒)撫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253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清光緒二年刊本影印），卷56，〈理學〉，頁2。

下，如車紹祖便是先習於何自學門下，後來才轉向吳與弼；正德年間，崇陽聶曼也是先從其族叔祖習《尚書》，繼從舉人（衡塘）全理習《易經》。¹⁵所以吳與弼的出現，只是在士紳群或博學之士以外多增加一個選擇。相較之下，陽明心學則是全面籠罩，而對金溪土人帶來深遠的影響。

正德、嘉靖年間心學流風興起後，尤其王守仁（1472-1529）巡撫南贛期間，吸引不少金溪士人前往問學。如黃直（1500-1579）、黃株、仲嶺胡民悚與胡民懷，都是以諸生的身分拜入王守仁門下。¹⁶黃直在考取進士功名以後，還與鄰縣陳九川（1494-1562）共同編纂《陽明文錄》。¹⁷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正德九年進士，是撫州當地的大儒，《明儒學案》中列名於〈江右王門學案〉。

嘉靖初年，陽明大弟子鄒守益、歐陽德（1496-1554）等人在南京講學，也吸引金溪土人前往問學。如胡民悚、胡民懷兄弟，先師從王守仁，後又前往南京習於鄒守益門下。¹⁸如上源徐達，正德十一年（1516）舉人，擔任南京國子監學正期間，便跟隨歐陽德講學。¹⁹此外，另有義門陳宗慶，嘉靖十九年（1540）舉人，習

¹⁵ 見張烜，〈明故南京國子助教修職佐郎元齋聶公墓誌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石刻）。

¹⁶ 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0，〈儒林〉，頁11。《仲嶺胡氏族譜》（無年份，金溪縣合市鎮仲嶺胡家村胡勤生收藏），卷首，〈道學〉，頁69-70；卷10，〈儒林〉，頁12。

¹⁷ 現存的嘉靖年間刊本《陽明先生文錄》，就是陳九川、黃直等人共同編纂的。

¹⁸ 《仲嶺胡氏族譜》（金溪合市鎮仲嶺胡家村胡勤生家藏，年份不詳），卷首，〈道學〉，頁69-70；《(道光)金谿縣志》，卷10，〈儒林〉，頁12。

¹⁹ 黃直，〈文林郎成都府推官石屏先生墓誌銘〉，《上源徐氏宗譜》（金溪琉璃鄉印山上源徐永興家藏，民國三十五年十修），卷7，頁9-10。另見《上源徐氏

心學而築精舍於石泉，²⁰以及崇陽聶蘄，則是習於程朱學大儒呂柟（1479-1542）門下。²¹

黃直、胡民懷、陳宗慶，以及地方士紳洪範、王莫²²等人，形成在地的心學群體，共同舉行翠雲講會，²³陳九川、鄒守益，以

宗譜》，卷7，〈石屏公縣志本傳〉，頁1，儘管說是縣志本傳，但在道光年間的《金谿縣志》的徐達小傳中，則未書與歐陽德講學事，而且傳記內容亦簡短得多。見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14。

20（義門）《陳氏宗譜》（金溪秀谷鎮嚴良陳家村陳國華家藏，清同治五年修），無卷數，〈列傳〉，頁3。

21 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13-14。當聶蘄將返鄉時，呂柟為其作〈贈聶士哲還金溪語〉，見聶友于等修，《崇陽聶氏族譜》（金溪合市鎮崇麓聶家村聶海平家藏，鼎容瑞堂2012年重鑄），卷4，頁396-398。

22 王莫出自臨坊王氏，是當地的大族，祖父王稽是景泰五年（1454）進士，父親王序是成化十三年（1477）舉人（《臨坊王氏族譜》（民國三十三年修），卷2，〈官銜錄〉，頁1），兄長王萱，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是正德朝的名臣，王莫本人則是正德六年（1511）進士。王萱、王莫二人的小傳，分見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9，〈名臣〉，頁4-6；卷10，〈儒林〉，頁10-11。

23 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0，〈儒林〉，頁11；吳悌，《吳疎山先生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吏部，第83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據湖南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頤園刻本影印），卷9，《年譜》，頁3-4，「正德十四年」條：「嘗與黃卓峰先生、洪柏山先生、王東石先生、陳明水先生講學于邑之翠雲山。」

據（義門）《陳氏宗譜》所載，陳宗慶與鄒守益、唐樞往來，而鄒、唐二人皆曾參與翠雲講會，所以推知陳宗慶也在此群體及講會中。見《陳氏宗譜》，無卷數，〈列傳〉，頁3。

吳悌稱胡民懷是其業師，推測應是在翠雲講會中向其請益，故以業師稱之，見吳悌，《吳疎山先生遺集》，卷4，〈胡生汝宣誌銘〉，頁9。

及歸安唐樞（1497-1574）皆曾來與會，²⁴幾人並不只是參與講學而已，而是以大儒的聲望，吸引更多當地士人的參與，以支持及扶植此講會。

吳悌這位大儒的出現，則是讓金溪的心學脫離他地學術附庸的關鍵，也讓金溪士人不再只有外出問學一途。吳悌出自疎溪吳氏，他少時讀《陸象山語錄》，慨慕之，於是負笈從黃直講求性命之學，²⁵以及參與翠雲講會。此後吳悌在疏山講學，吸引來自金溪各鄉家族的士人前來聽講，心學遂藉此在金溪廣為流傳。以印山上源徐氏為例，當陽明心學流行之初，徐達（正德十一年〔1516〕舉人）必須前往南京師從歐陽德，²⁶然後回鄉舉行月會，以傳播心學。²⁷後續族人徐永修嚮慕理學，則可就近師從吳悌（徐永修後來轉師羅汝芳，此事後詳），以及棄儒從商的徐銓，亦曾

24 張應雷，〈金谿理學支派略二則〉，見吳悌，《吳疎山先生遺集》，卷12，附錄，頁6：「時有洪柏山先生（按：洪範）、王東石先生（按：王莫）有翠雲之會，而吉安鄒東廓先生（按：鄒守益）、歸安唐一庵先生（按：唐樞）、臨川陳明水先生（按：陳九川）皆來會焉。」

25 沈鯉，《明南京刑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莊疎山先生吳公神道碑銘》在吳振中、吳順昌修，《疎溪吳氏宗譜》（民國三十年修），卷8，頁1；沈鯉，《吳文莊公神道碑》，在吳悌，《吳疎山先生遺集》，卷10，附錄，頁17。

26 黃直，〈文林郎成都府推官石屏先生墓誌銘〉，《上源徐氏宗譜》，卷7，頁9-10。另見《上源徐氏宗譜》，卷7，〈石屏公縣志本傳〉，頁1，儘管說這是縣志本傳，但道光編的《金谿縣志》的徐達小傳中，則未書與歐陽德講學事，而且傳記內容亦簡短得多，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14。

27 徐鳴奇，〈鄉社祠記〉，見徐雲淋修，《印山徐氏宗譜》（金溪琉璃鄉印山徐樣清家藏，民國三十五年十修），卷7，〈鄉社祠記〉，頁3：「吾黨故稱仁里，自別駕君（似指徐達）潛倡濂洛關閩之學於鄉，鄉之人翕然嚮之，乃月為會於孫坊。」

向吳悌問學。²⁸

吳悌之子吳仁度（1548-1625），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雖為名臣，但不以學術見長。²⁹吳悌的兩名弟子李約、黃宣³⁰，李約在吳悌沒後，為輯其論學語為《言行錄》，黃宣更知名，他出自黃坊黃氏，該族雖非大族，黃宣憑己之理學成就，取得極高的聲名，而他與臨川李東明共同主持的講會，更是引領一時的風氣。所以在其卒後，吳道南（1550-1624）為作墓誌銘，譽其為「理學儒宗」，周孔教（1548-1613）為其篆額書丹，尹文煒作墓表，揭重熙隸蓋，車殿彩書丹，稱許其——「世儒高自標許，遠乞濂洛關閩之殘膏，近襲王文成（按：王守仁）、羅文恭（按：羅洪先）之餘唾，卒未始一蹈道者」，黃宣正是蹈於道者。³¹

金溪土人還嘗試把陽明心學跟金溪本地的陸九淵學術連結起來，而且對陸九淵學術的推崇，跟陽明心學在金溪的流行是同步起來的，他們未必是在學說內容上結合兩家學術，而是把陽明心學納入到金溪所自豪的陸九淵的心學中，讓陽明心學變得在地化。也因此，我們看到文獻上對金溪土人學習心學歷程的敘述，往往會強調土人對陸九淵學術的興趣。如前引的黃株，地方志便記載他最初究心於陸九淵心學，待王守仁倡道贛州，前往詣謁，王守仁叩其所得，黃株說：「良知是頂門一針，躬行實踐纔有歸

宿處。」³²可知他所傳承的是王守仁的良知心學，但在文獻的記載中，則特別點出他曾習陸九淵之學，正是把陽明心學放到陸九淵的心學傳統下。沈鯉（1531-1615）對吳悌的記載，也強調他少時讀陸九淵《語錄》，而時人更將吳悌與陸九淵並列——「世謂金谿理學，宋有象山，明有疎山。」此外，金溪土人還積極推動陸九淵的從祀，吳世忠（1461-1515）與徐達這兩位金溪土人，便先後疏請將陸九淵從祀孔廟。³³

不過，來到萬曆年間因羅汝芳而有新變化。羅汝芳是南城縣人，在《明儒學案》中被歸類在「泰州學案」，被視為左派王學的代表人物，過去對羅汝芳多注意他四方講學，以及講學的社會性，而較少注意到羅汝芳的地域性，但其實他對撫州地區的影響甚大。

萬曆初年羅汝芳致仕歸鄉，他雖是南城人，但常前往府城臨川及鄰縣金溪講學，臨川的講學地在城內羊角山、正覺寺一帶，³⁴金溪的在疎山一帶，³⁵這兩處都位於撫河沿岸，交通上便利，所以較容易吸引臨川、金溪兩地土人前來講學。當時吳悌已卒，不少金溪土人轉師羅汝芳。臨川、金溪兩地分別以李東明、崇陽聶良杞（1547-1619）與上源徐永修為代表。³⁶

32 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0，〈儒林〉，頁11。

33 最後是在薛侃的疏請下，陸九淵終於入祀孔廟。金溪土人的上疏，請見黃直，〈文林郎成都府推官石屏先生墓誌銘〉，《上源徐氏宗譜》，卷7，頁9；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14。

34 同上注，頁17。

35 李東明，〈徐得吾先生傳〉，《印山徐氏宗譜》，卷7，頁8。

36 徐永修屬於金溪的印山徐氏，印山位於金溪與臨川交界處，有一部分的房支劃在臨川，一部分劃在金溪，所以徐永修既是臨川人也是金溪人。

28 熊應祥，〈徐晴峰公傳〉，《印山徐氏宗譜》，卷7，頁1。

29 吳仁度有《吳繼疏先生遺集》傳世，但多為奏疏、奏議。

30 《言行錄》附錄於《吳疎山先生遺集》卷8。李約的傳記見：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0，〈儒林〉，頁12。

31 吳道南，〈明賢原任袁州府教授陞國子監監丞黃重庵先生墓誌銘〉，《黃氏十修族譜》，卷6，頁9；尹文煒，〈明理學鄉賢黃重庵先生墓表〉，同前書，卷6，頁10。

李東明是臨川貢生，後棄舉子業，而專志於性命之學，他在羅汝芳卒後，繼續傳揚其學，地方士紳為其創建崇儒書院供其講學。³⁷吳悌的大弟子黃宣亦與李東明共同講學，講學地點可能就是崇儒書院。聶良杞是隆慶二年（1568）進士，聶曼的族子，他最初習於吳悌門下，與吳悌之子吳仁度共同執經講業。³⁸待羅汝芳為講學主盟，聶良杞遂從遊參證，悟程門識仁之旨。³⁹上源徐永修，布衣，羅汝芳在正覺寺講學時而師從之，與楊起元（1547-1599）並列為羅汝芳最愛的兩名弟子之一，據載羅汝芳甚至稱譽他——「徐子撫州一人，撫州無二徐子也。」⁴⁰

即連明初與吳與弼關係最深的舉林車氏，族人也受到羅汝芳講學活動的影響。如湯顯祖為車會同所作的墓誌銘指出：

（車）會同，字文修，世居金溪黃坊里，……長讀其鄉宗儒陸象山《語錄》，輒慨慕之，乃師事少初徐先生（按：徐

³⁷ 童範儼等修，陳慶齡等纂，《（同治）臨川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946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清同治九年刊本影印），卷42下，〈儒林〉，頁12-13；徐朔方，《湯顯祖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139-140。地方士紳有鑑於羅汝芳來臨川時，只能借佛寺講學，所以在萬曆二十六年（1598）為李東明建崇儒書院。

³⁸ 據《全氏宗譜》所載全楷之子全大作的經歷，讀書吳悌家，同學即聶良杞與吳仁度。原文如下：「（全楷）子全大作，當時聶懷竹先生館於吳疎山公家，全楷命往從之，與今少參聶念初公（按：聶良杞）、中書吳繼疎公（按：吳仁度，吳悌之子）同執經一年，朝夕琢磨，頗有進益。」全大謹，〈三松公行述〉，《全氏宗譜》（金溪合市鎮全坊村全自康家藏，民國三十七年修），卷12，2號。

³⁹ 錢士升，〈明廣西布政司參議念初聶公墓誌銘〉，聶友于等修，《崇陽聶氏族譜》，卷5，頁151。

⁴⁰ 李東明，〈徐得吾先生傳〉，《印山徐氏宗譜》，卷7，頁8。

良傳），講性命之學，而學業大成。……嘗從近溪羅先生、明水陳先生探究根宗，即日食弗給，尤不廢學。……與谷南高公（按：高應芳）、龍岡徐公講求實學。⁴¹

在此記述中，車會同也是因讀陸九淵的語錄而慨慕心學，然後師事徐良傳，從羅汝芳講學，並與高應芳往來。徐良傳是東鄉人，晚年移居臨川，⁴²高應芳是與羅汝芳同在臨川講學的士紳。⁴³從車會同所師從往來的人來看，他應亦移居臨川，而且在羅汝芳的講會中。

至此，我們應當作一小結。從明初吳與弼，到明中期的心學，可以藉由對比看出，吳與弼的學術對金溪的影響有限，而明中期陽明心學的流行則為金溪的學術生態帶來很大的改變。當地土人重提陸九淵的心學，並試圖從陸學到陽明學建立系譜，陽明心學不僅不是外來的學術，反而有助於本地的學術傳統的重建重生。這個系譜的鞏固及完成，則有賴於吳悌這位大儒以及當地心學社群的成立，因此在敘述金溪的心學發展史時，吳悌得到極高的評價，如鄒元標（1551-1645）說吳悌是「早事卓峰，取證心齋，觀摩鄒、羅二先生」，⁴⁴卓峰、心齋與鄒、羅，分別是黃直、

⁴¹ 湯顯祖，〈明故端吾先生舉三公墓志銘〉，《舉林車氏十修族譜》，146號。

⁴² 李士棻等修，胡業恆等纂，《（同治）東鄉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793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同治八年刊本影印），卷13，〈儒林〉，頁9。

⁴³ 主要有高應芳與舒化，見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17。地方志記載高應芳是金溪人，後來移居臨川。但他其實屬於臨川嵩湖高氏，金溪的珊瑚高氏是其分支。

⁴⁴ 鄭元標，〈吳文莊公墓表〉，《吳疎山先生遺集》，卷10，附錄，頁9。鄒守益、王艮都是較長一輩的學者，姑且不論，而從吳悌與羅洪先的問答內容來

王艮、鄒守益與羅洪先四人，其中王、鄒、羅都是當代最知名的心學學者，而鄧元標把吳悌的學術淵源連結到三人，所以金溪士人何宗彥（1559-1624）也將吳悌與羅洪先（1504-1564）並列齊稱，⁴⁵凡此都是為高舉吳悌的學術地位。沈鯉對吳悌的評價更高，他除了把吳悌往上接到陸九淵的心學傳統，還把吳悌列為胡居仁以下江西的第二位真儒，地位甚至凌駕鄒守益、羅洪先等人之上，他說：

先生雖早師黃氏卓峰，淵源姚江，而實不局良知之說。……世謂金谿理學，宋有象山，明有疎山。余直謂江右真儒，前有敬齋（按：胡居仁），後有疎山。⁴⁶

但客觀來看，吳悌在明代心學或理學史上的地位，其實是可以再斟酌的，至少吳悌的聲名及影響力，應不如鄒守益、羅洪先等人，所以黃宗羲（1610-1695）的《明儒學案》便未錄吳悌。若要持平論斷，他的地位應更接近新城鄧元錫（1529-1593），二人都是江右陽明心學陣營的一員，但相較於鄒守益等人，則其聲光明顯較弱。

看，鄧元標用「觀摩」其實不盡精確。

45 吳悌與羅洪先的問答，請見沈鯉，〈吳文莊公神道碑〉，在吳悌，《吳疎山先生遺集》，卷10，附錄，頁23-24。何宗彥也是金溪人，而他在列舉江右諸先生之深於理學者，便舉出羅洪先與吳悌二人，儘管在《明儒學案》未錄吳悌，平心而論，吳悌之聲名亦不足以與羅洪先相提並論，但何宗彥所說應可代表當時金溪士人普遍的看法。見何宗彥，〈理學議〉，在吳悌，《吳疎山先生遺集》，卷首，頁1。

46 沈鯉，〈明南京刑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莊疎山先生吳公神道碑銘〉，在《疎溪吳氏宗譜》，卷8，頁18。

因此，羅汝芳晚年在臨川講學遂引來下一波的心學熱潮。在建昌府，鄧元錫的弟子往往也師從羅汝芳，鄧、羅兩人共同教導門人。在撫州府，由於吳悌早卒，所以吳、羅二人之間雖無交集，但吳悌門下弟子往往也轉師從羅汝芳。如果說鄧元錫與吳悌的影響力主要在一縣之內，羅汝芳則是擁有跨地域影響力的大儒，影響整個撫州地區。金溪也因此更進一步融入到整個江西的心學圈中。

三、從理學講會到制藝文社

撫州府的制藝發展主要以臨川為中心，以及原屬臨川但在正德年間被劃出的東鄉（艾南英是東鄉人），而金溪最初並不在此風潮中。臨川先有湯顯祖，後有丘兆麟（1572-1629）與陳際泰（1567-1641）聞名於世，而章世純（1575-1644）、羅萬藻（？-1647）聲名後起，陳、章、羅與艾南英（1583-1646）合稱江右四大家。⁴⁷

江西制藝文社，以最初的紫雲社與全省的豫章社最值得注意。萬曆二十八年（1600）的紫雲社，應是撫州地區較早也較重要的制藝文社，據陳際泰說：

金臨之間有古刹而名者曰紫雲，予與同人結社其中，曾氏一父之子預者，蓋四人焉。前後颺去者為丘毛伯、游太來

47 陳孝逸，《壺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原北平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影印），卷1，〈府君行述〉，頁10。

(按：應作泰來，即游王廷)、曾銘西(按：曾棟)、祝文柔、蔡靜源(按：蔡國用)、管龍躍(按：似指管天衢?)、章大力、羅文止，此皆弟畜泰者也，然當時年最少，材又最高，則銘西之弟叔子與季子其人焉。⁴⁸

此社所在紫雲寺及寺所在的項山，位於金溪、臨川、南城三縣交界處。⁴⁹參與該社的士人，主要以來自臨川騰橋鄉的曾氏父子與陳、羅、章等臨川士人為主，以及一位名義上來自金溪的士人蔡國用(1579-1640)。⁵⁰所以從紫雲社成立，到江右四大家之名大顯，主要都跟臨川士人有關。

萬曆四十三年(1615)的豫章社，則是集結全江西各地的知名制藝作手為一社——

大冢宰李長庚任江西左布政，其子春潮才而好奇，合豫章諸能文者為豫章社，臨川則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東鄉則艾南英，泰和則蕭士瑋(1585-1651)、曾大奇，吉水則劉同升(1587-1646)，南城則鄧仲驥，豐城則楊惟休、李炱，進賢則陳維謙、李光倬、陳維恭，皆郡邑間最馳聲者，而南

⁴⁸ 陳際泰，《已吾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原北平圖書館藏清順治李來泰刻本影印)，卷3，〈曾叔子合刻序〉，頁7。

⁴⁹ 紫雲寺原名項山寺，後因有僧名紫雲者崛起，與疎山白雲，一時並盛，稱兩高僧，故復名此寺為紫雲寺。見丘兆麟，《玉書庭全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重修本)，卷8，〈項山寺賦〉，頁8-9。

⁵⁰ 據其族譜記載：後嗣公，蔡國用之父蔡際春。羅萬藻、陳際泰皆為作墓誌銘。據陳際泰所撰，可知從後嗣公曾大父，便已從金溪靖思，遷居南昌，後嗣公則遷臨川北鄉楓林里。

昌、新建，首時華與萬曰佳、喻全祀，時華尤為所推服。⁵¹

能夠受邀參加豫章社的都是已有文名者，所以人數不多。⁵²社員名單上的土人可分作三批，一批是湯顯祖的門人，即江右四大家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艾南英等人，來自撫州府；一批是舒曰敬的門人：李炱、萬時華(1590-1639)、陳維恭、李光倬等人，來自南昌府；⁵³一批是蕭士瑋、曾大奇與劉同升，來自吉安府。

從紫雲社到豫章社，金溪土人都不在這些制藝文社中，而且金溪當地的學風仍以理學為主，尤其是黃宣與臨川李東明的講學，便是當時頗知名的理學講會。當時金溪也有制藝寫作方面的文社，但社集成員往往以家族後人為主，如張應雷(1534-1608)、聶文麟(1579-1667)二人在縣城城南及寶山的社集，便是為了家族族人應考而設。張、聶二人並不以制藝聞名，必須等到天啟、崇禎年間，受到江右四大家，尤其是艾南英的影響，金溪方才出現以制藝著稱者，兩位代表人物——吳堂、陳畫，他們

⁵¹ 陳弘緒，《敦宿堂留書》(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二十六年陳致刻本影印)，卷1，〈先友祀鄉賢萬徵君傳〉，頁39(總446)。

⁵² 李光元不在名單中則頗不可解，他是萬曆三十五(1607)年進士，但不久以病歸養，直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方才再出，可知此時他人在江西，而未參與這類社集活動，僅有素常與其師友唱和的從弟李光倬與會。李光元與李光倬的關係，見《(同治)進賢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第59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據清同治十年刻本影印)，卷19，頁25。

⁵³ 舒曰敬一方面以制藝聞名，同時還曾編纂《皇明豫章詩選》一書，這本書是受到復古派流風的影響，而詩選卷首有18名舒曰敬的門人弟子的名字，應即負責編纂詩集的人，其中便有李炱、萬時華、李光倬、陳維恭。

都因艾南英而獲得較高的聲名，而且與陳孝逸、傅占衡等一批年輕的臨川士人往來。

由於講會或社集初始的發展都跟家族有關，所以以下便從家族切入分述之。本節先談萬曆初年張應雷、聶文麟、黃宣等人所屬的家族及其社集，下一節談吳堂、陳畫的社集及活動。

1. 橫源張氏

橫源張氏的關鍵人物即張應雷，他少時慕先儒象山之學，拜入王勑門下，王勑是黃直的學生，推測他也在翠雲講會中。⁵⁴另一方面，張應雷頗受吳悌器重，常隨侍其身邊，吳悌卒後，還協助其弟子李約編《言行錄》。⁵⁵另一方面，張應雷、從兄張默、張熟兄弟、從子張材幾人相師友，⁵⁶張應雷、張默、張材在縣學更有「三張」之稱，與瑤嶺謝氏的「四謝」並列。⁵⁷大約在嘉靖末年前後，以幾人為中心舉行家會，地點則在縣城南區，如其族譜所載，以及張熟所自述：

叔父諱熟，字思仁，別號純所，余父恭所公（按：張

⁵⁴ 王有年編，《(康熙)金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798號，台北：文成出版社，1989，據清康熙二十一年刊本影印)，卷7，頁14。王勑是王有年之父。

⁵⁵ 張應雷未拜吳悌為師，所以自稱「邑後學」，又說：「雷侍先生久，知先生亦深，遂條舉耳目睹記，并二三大老所齒及逸事。」此段文字是為李約編的《言行錄》作跋。見張應雷，〈跋〉，*在吳悌，吳疎山先生遺集*，卷8，頁27。

⁵⁶ 張應雷生於嘉靖十五年(1536)，隆慶五年(1571)進士，家會應是進士及第以前的事，所以推測時間落點在嘉靖末年。

⁵⁷ 張元輔，〈惺台公傳〉，張蔭階、張啟元等修，《橫渠張氏宗譜》(東邑宗美仁齋1995年新鑄本)，卷8，頁134-135。

默），與湖州司理叔順齋公（按：張應雷），成理監理兄惺台公（按：張村），相師友，為家會。⁵⁸

熟總角時，未就外傳，從伯兄恭所先生，學於邑之南城。⁵⁹

爰聚太參王如水、司理王文石、國博高環北，洎從弟姪庠彥十餘輩，日琢磨規勸，華實並茂，故城南會為谿首稱焉。⁶⁰

可知此會以橫源張氏族人為主，加上縣學中的其他士人。此會應跟制藝寫作有關，由於幾個中心人物在科考上皆有表現——張應雷是隆慶五年(1571)進士，張默是隆慶三年(1569)貢生，⁶¹張材是隆慶四年(1570)舉人，⁶²張熟是萬曆十六年(1588)舉人，⁶³所以此會一時之間頗有聲名。也因此，大約到了萬曆晚期或天啟初年，⁶⁴城南會進一步發展成為禹門社，陳際泰為此社的社刻作序：

禹門社介臨、金之間，是諸雋之所走集也。其得名，張順

⁵⁸ 張機，〈寄嵐太守叔父純所公行狀〉，張蔭階、張啟元等修，《橫渠張氏宗譜》，卷8，頁124。

⁵⁹ 張熟，〈伯兄文林郎公安太尹恭所先生行狀〉，張蔭階、張啟元等修，《橫渠張氏宗譜》，卷8，頁105。

⁶⁰ 同上注，頁107。

⁶¹ 同上注，頁105-115；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20。此文作於萬曆十七年(1589)，張默卒後次年。

⁶² 張元輔，〈惺台公傳〉，張蔭階、張啟元等修，《橫渠張氏宗譜》，卷8，頁134-136；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22。

⁶³ 張機，〈寄嵐太守叔父純所公行狀〉，張蔭階、張啟元等修，《橫渠張氏宗譜》，卷8，頁124-127；(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30。

⁶⁴ 序文中提及周鍾、張溥倡導經術，而二人崛起於天啟年間，所以可推知禹門社也是在此刻重振。

齋先生實為之，先後社于是者，翔去不可枚舉，中輟者數年，近乃復有吾黨之刻而儼其人。蓋地重而人因重，不敢以虧疎佐小之氣辱此名社也。⁶⁵

此社是從張應雷啟始，而張應雷卒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所以從城南會到禹門社，中間可能曾經中斷多年，直到江右四大家倡導制藝才又重振。⁶⁶

2. 崇陽聶氏

崇陽聶氏在明中晚期的知名人物分別有：

聶曼，長房 15 代，正德十一年（1516）舉人

聶蘄，幼房 14 代，嘉靖四年（1525）舉人

聶廷璧，長房 17 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

聶良杞，幼房 15 代，隆慶二年（1568）進士。子聶文麟

聶文麟，幼房 16 代，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

聶惟鋌，幼房 18 代，萬曆四十六年（1618）舉人

崇陽聶氏之科目仕宦自聶曼始，⁶⁷而聶蘄開始接觸理學（習於

呂柟門下），並與吳悌為莫逆之交。⁶⁸吳悌是金溪當地的理學大儒，而聶蘄與其交遊，亦吸引其他聶氏族人接觸理學。此後聶廷璧雖不以理學著稱，但在當時金溪濃厚的理學氣氛下，仍被以理學評價，如其門人張學鳴說：

晚近世多趨道學，聚徒登壇，堯服禹步，然名實叵測也。師周情孔矩，青心如水，若在聖門閔冉流亞，而絕不以道學著，人亦不以道學擁師，而師之粹自晶瑩，若滌之清冷之淵。⁶⁹

聶良杞則與聶廷璧相師友，當時有「繡谷二疏」之譽。⁷⁰繡谷是金溪的別稱。聶良杞先後師從吳悌與羅汝芳，悟程門識仁之旨，他甚至被拿來跟南昌鄧以讚（1542-1599）相提並論。⁷¹

聶廷璧以其在寶山的別墅作為聶氏子弟的讀書場所——如聶惟鋌便曾讀書於此，⁷²並在此講學，所以也吸引非族人如王學禮的參與。王學禮受到整個心學思潮的影響，研精心性，有「赤子心

⁶⁸ 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 11，〈宦業〉，頁 13-14。

⁶⁹ 張學鳴，〈明中憲大夫崇野聶公墓誌銘〉，在聶友于等修，《崇陽聶氏族譜》，卷 5，頁 172。

⁷⁰ 曾化龍，〈明廣西參議進階朝請大夫念初聶先生行狀〉，在聶友于等修，《崇陽聶氏族譜》，卷 5，頁 88。

⁷¹ 錢士升，〈明廣西布政司參議念初聶公墓誌銘〉，在聶友于等修，《崇陽聶氏族譜》，卷 5，頁 150：「每為予稱江右理學風節之盛，輒言聶少參公（按：聶良杞）。少參公往矣，乃其皎皎大節，里中奉為典型，此（比）於鄧文潔公（按：鄧以讚）。」

⁷² 聶友于等修，《崇陽聶氏族譜》，卷 5，頁 191。

⁶⁵ 陳際泰，《太乙山房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6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明崇禎六年刻本），卷 4，〈禹門社序〉，頁 24。

⁶⁶ 所以陳際泰的序文中說「復有吾黨之刻而儼其人」。

⁶⁷ 蘇運昌，〈崇陽聶本立公墓誌銘〉，在聶友于等修，《崇陽聶氏族譜》，卷 5，頁 233：「崇陽聶氏之科目仕宦，實自鄉賓公之子曼始，從此至於明末，屢世不替，考名嘉暢，隱德弗耀。」

無失，青田路不賒」之句。⁷³

聶良杞與王學禮雖以理學著稱，但二人之子——聶文麟與王化澄（?-1652），則轉向制藝寫作，如王化澄有《二山制藝》，艾南英為其作序說：

登水弱冠讀書寶山，為憲副崇野聶公（按：聶廷璧）別墅。嗣是課藝於邑之槐堂，則象山陸先生之講室在焉。又十年有龍光之社，又三年有倅魁之社，又三年有畹香之社。丁卯（天啟七年，1627）結社於疎山，則吳文莊公（按：吳悌）讀書之故址。先後社刻皆載茲編，而得之寶山、疎山者為多，因名曰《二山課藝》。⁷⁴

王化澄約萬曆三十三年（1605）左右讀書寶山，⁷⁵天啟七年（1627）結社於疎山，而引文所說的龍光社、倅魁社、畹香社，應都是制藝文社。寶山與疎山原本各是聶廷璧與吳悌的講學地，但僅僅一代左右的時間，都變成制藝文社所在。

⁷³ 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0，〈儒林〉，頁13。

⁷⁴ 艾南英，《天脩子集》（新北：藝文印書館，1980），卷4，〈王登水二山課藝序〉，頁30。

⁷⁵ 艾南英的序文中說王化澄只小他兩歲，可知王化澄生於萬曆十三年（1585），而弱冠時讀書寶山，故推知是萬曆三十三年（1605）左右事。聶廷璧是萬曆十三年（1585）致仕，卒於萬曆四十年，而聶良杞則是萬曆四十一年（1613）方始致仕居鄉，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聶良璧在講學及教導子弟。聶廷璧及聶良杞的致仕年份，見聶友于等修，《崇陽聶氏族譜》，卷4，〈外集貽封〉，頁347-348。

3. 黃坊黃氏

黃坊黃氏是地方小族，功名、文教皆不盛，但因有黃宣而使該族為人所注目。但該族學風到黃榜開有變。黃榜開是黃宣的長孫，崇禎六年（1633）副榜，少時習於臨川李東明門下，從相關記載如李東明「每呼乳名，盤駁性理諸書，辨答如響」，可知黃榜開初期所習的是性理之學，但在明末制藝風潮的影響下，黃榜開很快亦用心於制藝，並在靈谷山房結社，黃榜開的著作《靈谷社草》初集二集三集，推測應即靈谷社的社稿。⁷⁶此社成員還有劉星耀（1634年進士）、⁷⁷王騰龍（1660年舉人）、唐時英（不詳）等人。⁷⁸

舉林車氏族人也是靈谷社的成員。明初舉林車氏族人與吳與弼交遊，明中期車會同習於羅汝芳門下。明末車夢瑤（1622年進士）、車殿彩（1621年舉人），則與靈谷社有關，據載車夢瑤曾命其諸孫與門下弟子受業黃榜開門下，而車殿彩對黃榜開自稱社弟，可知他也在靈谷社中。

⁷⁶ 除了社稿以外，黃榜開亦操持選政，據載他「操選政，海內鉅作名篇，咸憑搨管出入」。見劉星耀，〈清故鄉副進士黃墨鮮先生墓表〉， 在《黃氏十修族譜》（金溪游彎鎮黃坊黃福堂家藏，民國十年修），卷6，頁13。

⁷⁷ 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38。

⁷⁸ 《黃氏十修族譜》中有劉星耀為黃榜開作的墓表，劉星耀、唐時英、車殿彩皆自稱社弟，見《黃氏十修族譜》，卷6，頁14。徐鵬起為黃宣所作墓誌銘中，徐鵬起、張有儀自稱社姪，推測二人亦在此社中。見同前書，卷6，頁12。

四、艾南英與明末金溪士人

金溪本地雖有制藝文社，但能夠跨出家族以外，帶動風潮並擁有跨地域聲名，則跟江右四大家所帶起的制藝風潮，以及艾南英的介入有關。

四大家中，陳際泰、艾南英二人跟金溪的聯繫較多。陳際泰曾為禹門社作序，而其《大乙山房文集》也是由金溪士人李士奇校對。艾南英則跟金溪的淵源更深。艾南英是東鄉人，生於萬曆十一年（1583），萬曆三十四年（1606）入府學，與臨川的陳際泰、章世純、羅萬藻等人齊名，日後四人刻制藝行世，於是有了江右四家之稱。⁷⁹在學術上，艾南英的祖父艾挺，師事金溪印山楊氏家族的楊用翔，楊用翔並無著作傳世，而據其族人所述，他「淬志古學，凡先秦兩漢八家之文，無不精心研究」，可知其學術傾向唐宋文，而從楊用翔而艾挺，於是「開天庸古學，卓然名家，源流皆本於公（按：楊用翔）」。⁸⁰艾南英在所作的墓誌銘中亦佐證此事，說：

石溪公為當時文章宗匠，予家世其學，源流與共，知之獨真。⁸¹

⁷⁹ 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列傳176，文苑4，頁7402。

⁸⁰ 《楊氏宗譜》（金溪琉璃鄉印山楊軍輝家藏，2005年重刊本），卷1，〈傳〉，頁6-7。

⁸¹ 艾南英，〈別駕午亭楊公暨黃安人合葬墓誌銘〉，見《楊氏宗譜》，卷1，〈藝文〉，頁17。該譜雖說此文是錄自《天傭子集》，但查《天傭子集》，未收錄此文。

艾南英所在的東鄉文教不盛，而其族亦不以文教見長，⁸²不知是否這個緣故，所以艾南英常跨縣與金溪士人——先有連城璧，後有吳堂、陳畫，共同編纂房選。

崇禎元年（1628），艾南英在蘇州，與金溪連城璧、揚州鄭元勳（1603-1644）幾人合閱房稿，選文800多篇，刻為《玉虎鳴》一書。⁸³艾、連二人是天啟四年（1624）同榜舉人，二人的合作紀錄僅此一則而已。連城璧的事蹟不顯，他所留下的《蹇愚集》多半是任官時的書信，所以難以從中窺知他在金溪的事蹟。

吳堂屬於大塘吳氏，但同樣未能訪得其族譜，他亦無著作傳世，但他人的文集及地方志上載其事蹟較多，顯示他頗受當時人所重，如康熙年間有人歷數江西制藝名家，便有吳堂之名——

子鄉先輩，如文止（按：羅萬藻）、大力（按：章世純）、千子（按：艾南英）、仲升（按：吳堂），固與大士（按：陳際泰）、毛伯（按：丘兆麟）齊聲並價，安在其必以甲科重哉！⁸⁴

陳際泰與丘兆麟皆有進士功名，所以列首，而其他幾人則是與陳際泰並列江右四大家的羅、章、艾三人，而吳堂亦與幾人並列，

⁸² 據其族譜所述：「艾為東邑望族，自天傭子來，多知名士。」可知在艾南英之前，該族文教不盛，所以清雍正年間鄭長瑞為其譜所作序時說：「艾氏宗譜有此一人，已足以光昭宇宙，而垂裕後昆。」見艾秉和修，《艾氏重修宗譜》（金溪琉璃鄉雙塘村艾氏家藏，1944年修），不分卷，頁56，以及鄭長瑞，《艾氏族譜序》，在艾秉和修，《艾氏重修宗譜》，不分卷，頁26。

⁸³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3，〈玉虎鳴〉，頁26。

⁸⁴ 張蔭階、張啟元等修，《橫渠張氏宗譜》，卷8，〈仁庵公序〉，頁169。

可見其聲名之高。清初王有年（1659年進士）也指出吳堂之聲名不被江右四大家之盛名所掩——

有明天啟、崇禎間，以制舉義相雄長者，章世純、陳際泰、羅萬藻、艾南英，天下號為四大家，四子皆撫州人，顧尤推吳公仲升，爭延致其家課諸子弟。是時仲升之文，孤行于世，不為四子所掩，至今學者奉之若高曾規矩。⁸⁵

此處雖泛指四大家「爭延致其家課諸子弟」，其實吳堂主要擔任艾南英子弟的西席，⁸⁶而且崇禎六年（1633）還與艾南英共編房選，此見艾南英所述，他說：

予既評定當代之制舉藝，分為二選，而或以丁未（萬曆三十五年，1607）迄戊辰（崇禎元年，1628）為近時流而便進取，因摘為八科房選；又因其去留頗嚴，復廣其所存而錄之，屬友人吳仲升訂其是否。⁸⁷

艾南英已評的房選是《戊辰房書刪定》與《辛未房稿選》二本，⁸⁸吳堂所協助修訂的則是《八科房選》這個選本。

崇禎九年（1636）吳堂中舉，他跟隨艾南英的脚步，繼續從事編纂房選的工作，只是此次改與陳畫合作。推測吳堂在崇禎十

⁸⁵ 王有年等纂修，《(康熙)金谿縣志》，卷8，〈人物〉，頁24-25。

⁸⁶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4，〈吳仲升稿序〉，頁36。此序作於崇禎九年，當時吳堂仍任艾南英二子西席，而吳堂也是在此年中舉。

⁸⁷ 同上注，卷1，〈八科房選序〉，頁17。

⁸⁸ 同上注，頁9-11、15-16。

年（1637）、十三年（1640）兩次入京應進士試，所以作崇禎十年、十三年的丁丑、庚辰科進士的房選選本。⁸⁹在崇禎皇帝崩殂次年，1645年，乙酉，吳堂隨同艾南英入閩，謁見唐王，授福建仙遊知縣，遂逗留該縣達8年之久，方才歸鄉。期間艾南英已卒，金溪亦已人事全非。

陳畫屬於義門陳氏，這個家族聚族而居，嘉靖朝以降功名表現十分顯赫。陳宗慶（1540年舉人）、陳鐙、陳鉦兄弟（1537、1546年舉人）皆有舉人功名，而陳一夔（陳鐙子）與陳所敏（陳一夔姪）更是隆慶二年（1568）的聯榜進士。以下陳于京（1603年舉人）、陳三俊（1615年舉人）、陳應斗（1618年舉人）、陳自挺（1636年舉人）亦科第簪纓不絕，如其譜所說——「金邑言家法，必推陳氏。」⁹⁰

該族的理學淵源初啟於陳宗慶，如其墓誌銘所述——「自青衿、孝廉時，即交游海內宿儒耆德」，所以前述黃直舉行翠雲講會時，陳宗慶亦在會中，而且與鄒守益、唐樞等人往來交遊，而其學大要以「象山、陽明為宗」。⁹¹吳悌卒後，陳宗慶上書提學使，促請照顧吳悌後人。⁹²

陳三俊以時文著稱，他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先以歲貢入

⁸⁹ 傅占衡，《湘帆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6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活字本刻本影印），卷8，〈吳陳二子選文糊壁記〉，頁8。

⁹⁰ (義門)《陳氏宗譜》，不分卷，〈列傳〉，頁3。

⁹¹ 同上注，〈列傳·岳州公〉，頁3；朱之蕃，〈勅授承直郎湖廣岳州府通判六山陳公墓誌銘〉，同前書，不分卷，〈墓誌〉，頁3。

⁹² 陳宗慶，〈六山公上督學使者書〉，(義門)《陳氏宗譜》，不分卷，〈書〉，頁1-5。

京，以其時文名震京師。據其族譜所述，陳三俊的制藝似歸有光古文，當時駙馬都尉楊春元之子楊光夔亦讀其文，並得到萬曆皇帝的稱許，據載：

光夔入宮，奉神宗皇帝起居。上問：「兒今讀何書？」對曰：「方讀貢元陳三俊時文也。」上曰：「文佳，兒宜以為法。」都尉（按：楊春元）即修書幣延為子師，禮遇甚隆。⁹³

明末該族最知名者即陳畫，陳畫雖無功名，但以學術而為族人所尊，稱其「儒林公」，而他在金溪當地的聲名，也被比擬為「與陳、羅、章、艾相伯仲」。⁹⁴陳畫應是在吳堂的介紹下而識艾南英，艾南英讚許其「於理學澄凝堅定，抱負海涵」，⁹⁵並稱陳畫、陳疇兄弟是「理學萃於一門」。⁹⁶但他不像吳堂隨從艾南英前往福建，而是始終居鄉在家，所以以他為中心，在金溪當地形成理學與制藝的群體圈。他的講學處是五柳軒，從遊者達數百人之多，若據族譜載其講習理學的情景——

講學於五柳軒，從遊者數百人，惓惓然以孝弟為重。⁹⁷

嘗講學于五柳園，從遊者皆衰衣大袖，歌詩揖讓，有儒者氣象。⁹⁸

⁹³ 同上注，〈列傳·蒼梧公〉，頁7。

⁹⁴ 同上注，〈列傳·儒林公〉，頁9。

⁹⁵ 同上注，〈列傳·儒林公〉，頁9。

⁹⁶ 同上注，〈列傳·隱逸公〉，頁10。

⁹⁷ 同上注，〈列傳·儒林公〉，頁9。

⁹⁸ 同上注，〈列傳·隱逸公〉，頁10。

另一方面，陳畫也教授門人與族人制藝，只是書房名卻作「重樂軒」。據《戌元櫟林周氏族譜》載其族人周居仁在此學習事：

時陳（畫）負重名，從遊者多名宿，每課文，必擇其尤精者付梓，公（按：周居仁）文與者十數，而試不售。⁹⁹

大約等到崇禎十七年（1644），¹⁰⁰陳畫集結諸父昆季同人友生之文，合為《重樂軒初選》，艾南英為其作序，說：

陳子惟易，取朋友之義，題其軒曰重樂，且集錄弟子課藝，合於文章法，與其諸父昆弟較習之作，以行於世，蓋憤近日之為舉業者，怪妖龐雜，思所以正之，而為是編也。¹⁰¹

陳畫的講學對家族及地方的影響頗大，所以直到他卒後，族弟陳甸仍繼續講學活動，後詳。

金溪年輕一輩的知名土人，除了吳堂、陳畫以外，還有孔大德，但因其相關資料甚少，所以附見於此。孔大德屬於聖裔孔氏，該族在金溪的其中一支位於河源鎮朱坊孔家村，該村至今仍

⁹⁹ 周穆菴修，《戌元櫟林周氏族譜》（金溪合市鎮龔家戌元村周新友家藏，道光二十四年重修本），卷1，頁77。

¹⁰⁰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首，《年譜》，頁4：「〈重樂軒序〉疑在是年。」但考其序文前後文意，實難想像值此明亡之際，陳畫仍編此書，且艾南英亦有暇作此序文。加上陳畫在崇禎十三年（1640）編《庚辰房選》，然後息影5年，若把崇禎十三年亦計算在內，則從崇禎十三到十七年正滿5年之數，所以推測該序作於崇禎十七年左右。

¹⁰¹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4，〈重樂軒初選序〉，頁61。

存「聖裔」牌坊一座，¹⁰²以及《聖裔孔氏宗譜》一部。孔大德屬於繡谷分支，居住在縣城內，該分支的族譜今已難以尋訪，加上孔大德亦無著作傳世，所以相關的資料很少，僅《聖裔孔氏宗譜》中載其考取天啟丁卯科（1627）解元，¹⁰³未載其他言行事為。

此外，翻檢各族族譜，另有金紫何氏的文社，相關資料極少，推測是家族內部的社集，亦附錄於此。金紫何氏的知名人物有何自學與何清，何自學是宣德二年（1427）進士，曾薦吳與弼於朝，¹⁰⁴何清是弘治八年（1495）舉人。但此後便無族人考取舉人以上功名。直到萬曆年間的何學夔與何學孔兄弟，這兩位是該族較知名的士人，他們負責祠堂祭儀的修訂，但也只是邑庠生而已。¹⁰⁵也因此，萬曆三十二年（1604）何學孔發起金紫文會，鼓勵族中子弟用功考取功名，與會者應都是何氏族人。¹⁰⁶

五、清初以金溪為中心的集會

明清鼎革之際，江右四大家中，除了陳際泰早卒，其他三家亦在此變亂之際亡故。章世純時任廣西柳州知府，在得知京師陷落後抑鬱而卒。艾南英先應羅川王之邀，起兵抗擊清軍於金溪，

¹⁰² 此牌坊的記載，亦見於《聖裔孔氏宗譜》（金溪河源鎮朱坊孔家村孔國珍管譜，年份不詳），卷尾，〈坊額記〉，頁1。

¹⁰³ 《聖裔孔氏宗譜》，卷首，〈坊額記〉，頁1。

¹⁰⁴ 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7-8。

¹⁰⁵ 何清的傳，見羅垣，〈希軒公傳〉，*在《金紫何氏重修合譜》（金溪左坊鎮后車何家何榮華管譜，民國三十一年版本），後卷，無頁碼；何學夔的傳見何容，〈賓虞公傳〉，同前書，後卷，無頁碼。祠堂祭儀事，見何學夔，〈修祠堂祭儀序〉，《金紫何氏重修合譜》，後卷，無頁碼。*

¹⁰⁶ 何學孔，〈金紫文會序〉，《金紫何氏重修合譜》，後卷，無頁碼。

待江西陷落後，入閩見隆武帝，次年，即順治四年（1646）病卒。¹⁰⁷羅萬藻則在料理完艾南英的喪事數月後亦卒。

明末江右四大家聲名最盛時，臨川年輕一輩的士人亦起而集結文社，較知名者即天啟七年（1627）的金石台大社，此社最初由陳際泰倡議，中間一度衰微，當張采（1596-1648）來任臨川知縣時復振而作之。陳際泰的二子陳孝威、陳孝逸，以及傅占衡（1606-1660）、吳程、曾有矩、舒紫芬、管子敬、游公大、劉鐘秀、鄒六奕等人皆在社中，成員共18人。¹⁰⁸

明清之際，該社成員不少亡故，即連陳孝威也在廣東病卒。一如傅占衡說：

曾上平（按：曾有矩）、吳先民（按：吳程）、舒紫芬、管子敬、游公大、劉文伯（按：劉鐘秀）、陳興霸（按：陳孝威），平生在六七知己中，謂之最貴矣，然壽亦不至中。¹⁰⁹

¹⁰⁷ 艾南英的生平，見胡業恒，〈天脩公事略〉，*在艾秉和修，《艾氏重修宗譜》，不分卷，〈傳〉，頁44-46。*

¹⁰⁸ 社集成員之名，請分見陳孝威，《壺山集》，卷1，〈曾上平傳〉，頁8，以及陳孝逸，《癡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卷3，〈虛葬亡友劉文伯墓誌銘〉，頁1。也有說14人，見陳孝威，《壺山集》，卷1，〈祭管子敬文〉，頁15：「上平（按：曾有矩）、紫芬、先民（按：吳程）、謝子、平生（按：陳奇才）、貞一、陸奕、宏止、文伯（按：劉鐘秀）、平叔（按：傅占衡）、威（按：陳孝威）、逸（按：陳孝逸），暨爾（按：管子敬），合為一人社一四人。」

¹⁰⁹ 傅占衡，《湘帆堂集》，卷6，〈陳平生別傳〉。陳孝逸也談及此事說：「壬午（崇禎十五年，1642），吳先民（按：吳程）死；不半歲，曾上平（按：曾有矩）又死；乙酉（順治二年，1645）冬，李君揚死，其年，北大將劉某掠豐城隱溪、文伯乃遇害死。」見陳孝逸，《癡山集》，卷3，〈虛葬亡友劉文伯墓

於是此時遂以陳孝逸與傅占衡成為社群的領袖，陳孝逸是陳際泰之子，早有文名，而傅占衡亦頗受一些士人的推崇肯定。¹¹⁰

一方面是同社的臨川士人亡故，陳孝逸、傅占衡二人在清初所經常往來的，反而不少是金溪、南城土人，如陳孝威自述——

敝邑曾上平、吳先民、劉文伯、管子敬，後先雕謝，痛我同盟。於今崔嵬靈光，獨平生（按：陳奇才）、亦人（按：李國昌）、伯子（按：涂柏）、惟易（按：陳畫）、玄近（按：鄭邑雋）、大千、平叔（按：傅占衡）輩數人耳。¹¹¹

盱江徐仲光（按：徐芳，1618-？）、金谿吳仲升（按：吳堂）、孔登小（按：孔大德，?-1660）、家惟易、鄭玄近（按：鄭倩），或遠或邇，然志同道合，跡疏心般。¹¹²

曾、吳、劉、管四人皆與陳孝逸同社的臨川士人，而幾人卒後，陳孝逸所引以為友的幾人，除了傅占衡、陳平生是臨川人，涂柏來自宜黃，以及徐芳出自南城以外，其他幾人——吳堂、陳畫、孔大德、鄭邑雋、李國昌，都是金溪人。

誌銘》，頁1。吳程、曾上平、陳孝威三人交情有如鼎之三足，三人間的往來，請見陳孝威，《壺山集》，卷1，〈吳先民傳〉，頁7；卷1，〈曾上平傳〉，頁8-9。

¹¹⁰ 如彭士望（1610-1683）推崇傅占衡的文章非湯顯祖與江右四大家所能及。見彭士望，《恥躬堂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咸豐二年重刻本影印），卷3，〈復王元升書〉，頁11；〈與魏善伯書〉，頁14。

¹¹¹ 陳孝逸，《癡山集》，卷6，〈寄歐無奇蕭繡虎〉，頁9。

¹¹² 陳孝逸，《癡山集》，卷6，〈答溫伯芳〉。鄭倩，字玄近，地方志上未載其人，請參考陳際泰，《已吾集》，〈鄭玄近新刻序〉。

陳、傅二人在清初看似消極困頓，但細察其行跡，卻似常前往他縣與該縣土人集會，如與南城徐芳，據載：

（傅占衡）與南城徐芳、鄧熲相契合，往來建武，留寓景雲、大平諸刹。¹¹³

（陳孝逸）常寓南城章山寺，與徐拙菴（按：徐芳）、鄧止仲（按：鄧廷彬）、蕭明彝（蕭韻）友善。¹¹⁴

由於都是在寺院聚首，所以幾人在此集會的可能性很大。如與貴溪張雲鶴，據載：

貴溪張雲鶴，字次飛，一字鐵公，……明亡，絕意仕進，築室章源山中，焚儒冠，髮鬢鬚不薙，裹頭，自製一氈帽，雖盛暑燕私不脫去，……與同里周鳳儀、金谿孔大德、臨川陳孝逸，訂煙霞交，秋暑雪餘，涼月在地，經營慘澹，詩趣婉贊，引觴互酌，陶然就醉。¹¹⁵

張雲鶴的態度應是反清的，而陳孝逸則經常與其集會。

¹¹³ 李人鏡等修，梅體萱等纂，《（同治）南城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818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卷8之1，〈流寓〉，頁20。

¹¹⁴ 李人鏡等修，梅體萱等纂，《（同治）南城縣志》，卷8之1，〈流寓〉，頁15。陳孝逸，《癡山集》，卷6，〈與鄧止仲〉，頁9：「客夏數度入貴郡，一寓章山寺。」

¹¹⁵ 楊長杰等修，黃聯珏等纂《（同治）貴溪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873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同治十年刊本影印），卷8之9，〈隱逸〉，頁7。

陳、傅二人也確實不斷出現在清初金溪士人的交遊及社集記述中，如疎溪吳玉爾的交遊圈中便有陳、傅二人——

(吳)玉爾，字玠軒，……以書經中崇正癸酉(六年，1633)鄉試第十一名，……軒坪徐登龍先生，公之故人也，道義相尚。當懷宗時，高隱不仕，與公及臨川傅占衡、陳孝逸，本邑吳堂、陳疇、陳畫、聶文麟諸先生唱和。¹¹⁶

徐登龍談易代之際聶文麟在鄉交遊事則說——

涉亂以來，惟同二三聲氣，及方聞布衣士，論文賦詩，此外杜門匿影，自當世諸新貴求聖見顏色不可得。¹¹⁷

文末有編者補充說：

此二三聲氣，蓋指臨川傅公占衡，字平叔；縣右孔公有德，號秀野；大塘吳公堂，號通隱；市心陳公畫，字惟易；陳公疇，字惟範；瑤溪傅公振鐘，字義然；大衍鄒公定本，

¹¹⁶ 《疎溪吳氏宗譜》，卷8，〈御史公傳〉，頁4。徐登龍是天啟四年舉人，相關事跡不詳，所引文雖說徐登龍是軒坪徐氏，但查該族族譜，未列徐登龍之名，不知何故。此段說徐登龍與吳玉爾二人是故交，高隱不仕，亦不盡然。吳玉爾在考取崇禎六年舉人以後任官，明亡則奔走王事於閩、浙間，最後悲憤絕粒，殉難於閩。「高隱不仕」有可能是族譜編者因政治忌諱而曲隱吳玉爾殉難的用詞。吳玉爾殉難事反而見諸地方志上，見胡釗、松安等纂修，《(道光)金谿縣志》，卷11，〈宦業〉，頁38。

¹¹⁷ 聶友于等修，《崇陽聶氏族譜》，卷5，頁19。

及徐公諸人也。¹¹⁸

吳玉爾是吳悌的族人，崇禎六年（1633）舉人；徐登龍的事蹟不詳，僅知他是天啟四年（1624）舉人。若先不談吳、徐二人，金溪當地應以吳堂、陳畫、孔大德等人為中心，加上崇陽聶氏的代表人物聶文麟。¹¹⁹ 這些人應會有集會或社集，所以陳畫傳記中的這段話便很值得注意——

(陳畫)與平叔傅公、蘇門聶公(按：聶文麟)、通隱吳公、秀野孔公，及弟惟範(按：陳疇)先生隱居講道。¹²⁰

前文談到陳畫在五柳軒講學，從遊者達數百人之多，此處亦指稱以陳畫為中心，隱居講道。另據臨川黃石麟所述，他與陳畫在金溪論學，而論學處應即五柳軒。¹²¹ 五柳軒的講學活動直到陳畫卒後，其族弟陳甸仍延續之，據載：

(陳甸)少從族兄惟易先生遊，潛心味道，臨川陳少游、同邑傅平叔、孔秀野諸先生，交相引重，往復切劘，益肆力關閩濂洛之學，大有所得。絕意仕進，繼惟易先生講學五柳

¹¹⁸ 同上注，頁20。

¹¹⁹ 聶文麟是聶良杞之子，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崇禎十五年（1642）致仕。致仕的年份請見聶友于等修，《崇陽聶氏族譜》，卷4，〈外集馳封〉，頁349。

¹²⁰ (義門)《陳氏宗譜》，〈列傳·儒林公〉，頁9。

¹²¹ 黃石麟，《半蕪園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5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黃承璽等刻本影印)。

軒，遠近來學者踵趾相錯，每會講，鄰師率學子環而聽者常百十人。公學以主靜為本，行以孝弟為基，……門弟子多騰踔于時，而馮夔颺太史（按：馮詠，1672-1731）兄弟受業沈深，名亦愈著。¹²²

也因此，「隱居講道」四字應該不是沒有實指。陳畫的五柳軒，很有可能是眾人往來聚會之處。而且相較於南城、貴溪兩地的集會，五柳軒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集會中心。文中的馮詠是金溪人，康熙六十年（1721）進士，是下一輩與李紱（1673-1750）並列，同於撫州最知名的士人。¹²³

陳孝逸、傅占衡往來金溪、南城、貴溪等地與人集會，原因為何，今已不得而知，從陳孝逸與彭士望、錢謙益、方以智（1611-1671）等人的往來，¹²⁴我們固然懷疑可能跟反清活動有關，只是苦無證據。但可確定的是，陳、傅二人，尤其是陳孝逸，隱然承續其父陳際泰的角色，成為撫州地區的士人領袖。也因此，當江南陳濟生在順治年間著手編纂《天啟崇禎兩朝遺詩》一書，諮詢陳孝逸的意見，而陳孝逸推薦予陳濟生的，除了江右四大家的作品以外，便是金溪陳畫與孔大德二人的著作。陳孝逸說：

宗兄名山之羅，所願任其驅役，第敝地諸先難，如帖上諸

122 (義門)《陳氏宗譜》，〈列傳·淑度公〉，頁15。

123 李紱，《穆堂初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道光十一年奉國堂刻本影印），卷34，〈馮李合彙序〉，頁25。

124 陳孝逸，《癡山集》，卷6，〈又東臯庵〉，頁12；同前書，〈答彭躬庵〉，頁17-18。

公，古文字特少，即有之，徵索不易。又其文字，或使人以不見為恨，其人更重。然已為布檄，得便續致。至於《章柳州》、《天傭子》、《小千園》等集，苦無貳本，不敢付，倘有閒力，卻抄寄也。孔登小《秀野廬雜詩》併《和陶詩》、家惟易《筮攷》，偶在几間，敬納去。二兄皆林慮徐無中人，吾黨之最嶽嶽者，頗有他著，會須宗兄見之。¹²⁵

《章柳州》、《天傭子》、《小千園》分別是章世純、艾南英、羅萬藻三人的著作，而陳孝逸因無三人著作的副本，擔心遺落而不敢寄送。¹²⁶而他所大力推薦的同輩士人，即金溪陳畫與孔大德二人著作。

陳孝逸、傅占衡，以及諸多金溪士人，以五柳軒為中心所形成的群體，他們在清初是不應科舉亦不任官的。前引貴溪張雲鶚的個案，他最極端的行為是不薙髮，其他人雖未如此，但亦自放於政權之外。這些士人在明末皆以制藝聞名，但入清以後，便不再殫心於此，傅占衡的話最可生動說明：

時文衰則師座廢，雖金谿人如無家人，兩生（按：吳堂、陳畫）效如是，安得不泥諸壁。自洪武辛亥（1371）以來，名儒鉅公、照史碩老皆專出於是。成弘間始微標名目，如王唐薛瞿。到崇禎末，房如蝶，社如蝗，言理學則周程張朱之

125 陳孝逸，《癡山集》，卷6，〈寄陳皇士太僕〉，頁17。

126 後來似是陳畫將《天傭子集》刊刻出版，有易學實作序，見易學實，《犀厓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8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卷5，〈天傭子敘〉，頁8；卷18，〈寄陳惟易〉，頁5。

嫡派在是，談文采則左丘明、司馬遷、劉向、楊雄，銜官奔走其助朝算裨世用則二十一史治亂成敗着列，未嘗不似。然其末也，上不能當一城一堡之衝，次不足備一箭一砲之用，最下不可言。由此論之，糊壁為幸。¹²⁷

所以我們另一方面也看到臨川李來泰（1631-1684）這個名字。李來泰，字仲章，號石臺，順治九年（1652）進士，他的官運並不亨通，因與上司不和被革職，還鄉後又被誣陷與耿精忠部屬勾結叛亂而下獄，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獲舉薦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才又入朝為官，並參與纂修《明史》。但他卻是康熙年間撫州地區的士人領袖，所以在這段時期的文獻資料中，都不斷看到士人提及李石臺這個名字，一如黃石麟所說——「學者莫不仰其言行以為當世之師」。¹²⁸這也凸顯，入清以後，大約一代的時間，陳孝逸、陳畫等人的社集活動便難再持續下去，所以樂安李煥章談及臨川、金溪入清以後社集活動之蕭索，說：

金溪，西江之名區，……即陳、章、羅、艾四家，洎陳興霸（按：陳孝威）、少游（按：陳孝逸）、傅平叔（按：傅占衡）諸君子，文章交遊之盛，今壇社寂寞，流風莫續，至於唏噓嘆息，泣下沾襟，舉坐為之罷懽。¹²⁹

李煥章所舉雖都是臨川土人，但仍可想見臨川、金溪兩地流風莫續的景象。

六、結論

本文主要利用族譜資料以重構地方小讀書人的交遊與社集活動。很多地方上的小讀書人因無著作傳世，所以往往只有地方志上簡短的幾行敘述，但這些人卻可能是地方社集活動的要角，如車泰來、張應雷、聶良杞、黃宣、吳堂、陳畫，這些人雖然不是當世第一流的人物，但在金溪當地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過去這些人的身影不曾出現在任何討論中，但少掉這些人，其實很難了解明中晚期金溪的思想文化發展，及其講會或社集活動。

利用族譜資料，配合文集、地方志，我們不僅重新認識這些人，也看到明中晚期金溪從心學講會轉向制藝文社的發展，以及江右四大家中的艾南英，加上吳堂、陳畫等人所主導的明末制藝文社。明亡清初，臨川陳孝逸、傅占衡二人與金溪土人之間的關係密切，而陳畫的五柳軒很可能就是整個撫州地區的集會中心。

過去對清初江西往往較注意江右三山的謝文淳（1615-1681）、寧都九子等人，然而，謝文淳、寧都九子，其實跟明末的文社群體關係不深，這也使得從明末到清初對江西思想文化史的敘述呈現斷裂而不連續的現象，似乎明亡以後，明末曾經活躍的一批人就此退隱淡出，而由另一批人走上主舞台。這個敘述固然不能說毫無道理，但仍不免太過粗略或簡化之嫌。

本文所做的，正是藉由不同性質的史料，復原金溪地方小讀書人的言行事為，進一步了解臨川與金溪土人群體的社集活動。若以臨川與金溪為基礎，應該有可能更大範圍掌握整個撫州地

127 傅占衡，《湘帆堂集》，卷8，〈吳陳二子選文糊壁記〉。

128 黃石臺，《半薰園集》，卷6，〈李石臺先生傳文苑〉，頁15。

129 李煥章，《織水齋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8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間鈔本影印），〈方叔衡詩草序〉，總頁773。

區，從明末到清初的地方小讀書人的動態。清初江右三山之一的謝文淳，他所在的南豐，亦屬於廣義的撫州地區，而他與這些士人群體之間的關係如何？也許會是很值得繼續深入的課題。

社集與身分／階層